

横渠书院从书 • 王志刚 刘学智 / 主编

北朝碑志文研究

魏宏利◇著

十一月十一日
北朝碑志文研究
魏宏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朝碑志文研究

魏宏利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朝碑志文研究 / 魏宏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6665 - 9

I. ①北… II. ①魏… III. ①碑文—研究—
中国—北朝时代 IV. ①K877.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95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北朝是中国古代碑志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出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考虑，魏晋以来的政府多采取禁碑政策，虽然执行的力度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墓碑文的创作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只要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墓碑文创作的数量与此前此后作一对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具体到北朝时期，相关史籍中虽然没有禁碑的明确记载，但墓碑文的创作同样处于萎靡的状态，只是到北朝后期情况才逐渐有所改观。另一方面，正因为墓碑文的发展受到阻碍，在长期孕育的基础上，一种新兴的志墓文体——墓志铭开始形成，并通过在北朝的大量实践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而唐代也正是在继承北朝墓志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文体，其中韩愈等人的创作更使墓志铭突破了实用文体的局限而趋于纯文学的境界。因此，北朝墓志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地位，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古时期的碑志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这一时期碑志创作所做的研究却不多见，近些年来，虽然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陆续有成果发表，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专就北朝碑志的创作进行研究总结的著述，这也正是本书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下面就本书的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创新点及研究的主要方法等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一 研究范围

研究的范围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的时间范围；二是研究的文体范围。下面对此略作说明。

本书研究所涵盖之“北朝”起自北魏登国元年（386），终于隋义宁二年（618），前后共计232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把隋代划入“北朝”的原因。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比较宽泛，就是

把隋代也划入“北朝”的范围之内；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隋代虽然历时较短，但属于统一政权，与此前其他北朝政权的地方性质有明显不同，所以应该区别对待。这种分歧同样体现在对这一时期碑志的研究中，比如赵万里先生所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①一书即将隋代墓志也收录在内，罗新、叶炜所编《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②同样辑录了隋代墓志。但是，赵超先生所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③一书却将隋代墓志弃而不录。

本书之所以将隋代墓志也纳入研究的视野，是因为这一时期碑志发展自身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点，同时也考虑了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

就这一时期碑志创作自身的特点而言：首先，隋代之前的碑志创作见于著录者绝大多数出自北朝，隋代碑志无论是从表现方式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强烈地显示出对北朝碑志创作成果的继承，虽然也有所发展创新，但真正的变革直到唐代中叶才告完成。所以，将隋代碑志的创作归入北朝碑志研究的范围是很自然的。

其次，隋代碑志的志主多生活于北朝后期，他们中有不少人历经北魏末年以来的数次政权更迭，大多在北齐、北周时代度过其人生主要的仕宦生涯，因此碑志所载其生平事迹有很多即发生在北朝末期，就碑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而言，将之纳入北朝的研究视野也是合理的。

将隋代划入“北朝”的研究范围还出于政治、文化之考量，隋代政权承北周宇文氏而来，其统治核心是以武川镇鲜卑军人集团为主并杂以关陇之汉族高门，则隋代虽为统一政权但统治之基础却源自北朝一系。此外，就政治制度与文化而言，隋代也与北朝一脉相承。陈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论及隋唐制度之渊源时曾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度广博纷复，然穷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魏、齐；二曰梁、陈；三曰魏、周。”^④则隋代政治制度所承接之三大源流中出自“北朝”者也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将隋代划入“北朝”的范围之内也是恰当的。

关于研究所涉及的文体范围，本书所指“碑志”是以墓碑（含神道碑）和墓志铭两大类为主。碑作为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石刻形制，其种

① 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②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③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④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 页。

类繁多，叶昌炽在《语石》中对立碑的体例进行了简要的划分：

综而论之，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一曰铭功……一曰纪事……一曰纂言……^①

这是单就立碑的目的、用途所做的划分，较为简单。赵超先生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一书中结合碑形石刻的文体、用途等多种因素将碑分为九类：墓碑、功德碑、纪事碑、经典及其他书籍刻碑、造像碑、题名碑、宗教碑、地图天文图礼图碑、书画碑。^② 其分类较为全面，基本上涵盖了碑形石刻的大多数种类，而本书研究所涉仅是赵氏所列九类碑刻中的第一种，即墓碑。当然作为碑之一种，墓碑无论就其外在形制还是写作技巧、语言风格都与其他几类碑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具体论述中如有需要将会综合讨论。

作为一种萌芽于汉代，魏晋以还逐渐发展，至北朝最终定型的志墓文体，墓志铭的创作构成了北朝碑志创作的主体，所以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与墓志铭功能相似的其他志墓文如墓表、砖铭、砖志、志铭、塔述、枢记、殡记等也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将墓碑与墓志铭合为一类加以研究，主要是因为这两者在使用功能、文体特征等方面有着极为相近的地方，前者立于墓上，而后者埋入圹内。此外，墓志铭产生较晚，其形成过程曾受到墓碑的极大影响，而在墓志铭创作逐渐成熟之后，其写作经验和技巧又对墓碑文的创作带来了有益的帮助，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所以将之合并进行讨论更有利于研究的展开。

二 研究的历史及其现状

对碑志的研究在传统上一直属于金石学的范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欧阳修等人的相关工作。此后，作为金石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碑志的研究代有其人，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至清代，金石学的研究出现繁荣局面，有关碑志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其中以王昶的《金石萃编》为代表。王氏的著作当然涵盖了整个金石学范

① 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0、181页。

②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8—32页。

畴,但专就碑志而言,全书对先秦以还作者所能收集的碑志文献一一进行了录文整理,文末则附录了有关碑志的考证文字并有作者对这些考证的进一步辨证,可以说是对前此碑志研究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代表了传统金石学研究在碑志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

到了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新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的使用逐渐改变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模式,不同于此前单纯的著录、考证,一些对碑志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开始出现,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叶昌炽的《语石》、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等。以《语石》为例,全书对石刻文献的时代沿革、地理分布、文体分类及特点、撰写体例、撰书、书人等问题都做了分析讨论,被誉为近代研究石刻最有学术水平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大量的碑志石刻陆续出土,有关碑志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碑志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碑志石刻的著录整理,这是传统金石学中碑志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涉及历代石刻文献的有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所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所编的《石刻文献全编》,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著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断代石刻文献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所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周绍良先生所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魏晋南北朝部分则有赵超先生所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王壮弘、马成名所编的《六朝墓志检要》等。也有专门整理著录一个地区石刻碑志文献的,如赵平所编的《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在这些整理中,有的仅仅著录碑志的拓印本,并简单附录碑志的形制、出土地点、时间等相关信息,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所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有的则为碑志的录文整理,如赵超先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有的则集二者于一体,如《新中国出土墓志》即采用前附拓本照片后录全文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方便研究者的使用;还有一类研究仅仅是对碑志的目录整理,如《六朝墓志检要》,全书将相关墓志的真伪、时代、尺寸、书体与著录检索等情况编目按照年代顺序列出,极便于读者的检阅。

其次,是将碑志的整理与研究合二为一,这种模式也为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所采用,前述王昶的《金石萃编》就是代表性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此类研究以赵万里先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为集大成之作,

全书除了对墓志的形制、历史价值进行考证之外,对于墓志的行文格式与规范等问题也有所涉及。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罗新、叶炜所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书,也属于同一性质的研究著作。

最后,是利用碑志文献进行的研究,其中利用碑志中丰富的历史信息进行相关史实考证的占相当的比例。也有将多种石刻材料汇集起来进行综合考证的研究,如赵超先生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①一书即广泛利用碑志文献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进行了整理校正,岑仲勉先生对《元和姓纂》所做的校勘也是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

当然,无论是利用单篇碑志进行的考史研究还是将多种碑志材料汇集起来作综合的考证,就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而言仍然属于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模式。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发展,近些年来,一些新的研究趋向和特点也开始出现:

一是研究呈现综合化,比如赵超先生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②《古代墓志通论》^③,这类研究其实是对叶昌炽等人研究成果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二是研究出现专题化,与综合性研究相反,此类研究不求探讨问题的面面俱到,而是就某一个专题展开深入的分析讨论。研究专著有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④,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⑤,魏平《汉魏南北朝墓志同根词研究》^⑥,刘盛举《魏晋南北朝墓志铭用韵初探》^⑦,金小栋《魏晋南北朝石刻年龄词语研究》^⑧,柏亚东《唐代墓志词语通释》^⑨,江波《唐代墓志撰书人及其相关文化问题研究》^⑩。单篇论文有赵超《试谈北魏墓志的等级制度》^⑪,刘昭瑞《石刻文字的著录和分

① 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 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③ 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巴蜀书社2004年版。

⑤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 西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 同上。

⑧ 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⑨ 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⑩ 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⑪ 《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类》^①，郭太松《浅谈碑刻纪时》。^②刘凤君《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③等。

三是对碑志文学特性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专著有绿仲珊《唐代墓志的文体变革》^④，黄清发《唐代墓志文研究》^⑤，黄今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⑥，严春华《中唐碑志文研究》^⑦，黄震《唐代墓志研究》^⑧。单篇论文有严春华《论中唐碑志文之题》^⑨，吴夏平《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⑩等。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如前所述，有关碑志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属于金石学的范畴，而传统的金石学又主要把碑志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资料加以利用，证“史”成为碑志研究的主要模式。但是，碑志作为一种实用文体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意义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非常零星散乱，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则付之阙如。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并没有在纯文学文体和实用文体之间作截然的划分，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无论是专门探讨文学理论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收录文学作品的总集，如萧统的《文选》都没有把碑志一类的实用文体排除在文学的范围之外。强行把这些实用文体排除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之外，固然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显得集中和纯粹，但就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文学创作生态以及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而言，这种研究思路显然存在着不足。前文提到，自20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逐渐得到运用，对碑志文学特性的探讨和分析开始受到关注，叶昌炽先生的《语石》就对此多所发明，而近些年来此类研究更渐成热点，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但到目前

① 《文博》1985年第5期。

② 《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③ 《中原文物》1988年第2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 复旦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 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⑧ 武汉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⑨ 《唐都学刊》2006年第6期。

⑩ 《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为止，尚未有人专就北朝碑志的创作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和总结。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黄今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一书对北朝碑志的创作有所涉及，但只是在书的第五章里讨论了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如北朝碑志繁兴的社会文化背景、北朝碑志与北朝文学等，而缺乏对这一时期创作的细致分析。此外，山东大学2004级赵海丽博士的毕业论文《北朝墓志文献研究》也对“北朝”的墓志创作有所论述。但是，赵海丽的论文只涉及墓志文献，包括墓碑（含神道碑）在内的其他志墓文体并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赵海丽的论文主要是从历史文献、文物保护的角度对“北朝”墓志进行相关讨论的，论文只在第四章里对“北朝”墓志的文学特质作了简要的分析。此外，赵海丽论文所涉及之“北朝”起自十六国终于北周，这与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并不完全重叠。概括而言，本书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书首次以北朝碑志为研究主体，并从“文”的角度对其创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具体而言，本书分别从北朝碑志的体制、题材内容、字句运用的方式及特点、典故运用、语言风格及表现方式多个方面对其创作经验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总结，这是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比如在对北朝碑志的志序进行研究时，本书针对志序中骈对句的对句方式及种类做了全面的分析和统计，其中仅双句对的对句模式就多达23种，而且具体到每一种模式，因为语法结构的差异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类型。本书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四六四六”式较之其他对句模式在实际的创作中更占优势地位，成为北朝碑志作家运用最为成熟的一种对句模式。

其次，本书还对北朝碑志的思想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而以往的研究则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结合碑志自身的文体功能，本书分别从“家族观念”、“忠孝观念”、“事功观念”及“生死观念”四个方面入手，对北朝碑志的思想世界进行了探索。以“忠孝观念”为例，本书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指出，北朝碑志中普遍存在着“孝为行本”的思想，“孝”成为个人品德最重要的社会评价标准之一，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上自最高统治者的帝王下至一般官僚都以践行孝道为职事所在。但是，北朝社会存“孝”也不废“忠”，当两者可以兼顾之际则同时加以提倡和鼓励，但当家、国出现利益冲突，“忠”、“孝”不能两全之际却明确要求舍“孝”从“忠”，以国家利益为重。到了北朝后期，在碑志中更强调“扬名后

世，孝之终也”^①的观念，荣养父母及父母死后守三年之丧固然是孝道，但“孝”的终极意义却在于立功当世以扬名显亲，相比起来，后者更能体现“孝”的价值和意义，这与南朝以来先“父”后“君”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后，本书对北朝碑志的源流及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关于北朝碑志的源流，尤其是墓志发展演进的历史线索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新的出土资料和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对此做出新的回答。关于后者，本书分别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角度对北朝中后期碑志创作出现繁荣局面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政治上的渐趋统一和稳定为碑志创作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一系列汉化政策的推行尤其是文化上对儒家学说的推崇也使得碑志的发展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和推动；北朝经济的逐渐恢复和繁荣又为碑志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本书还对北朝碑志创作中的其他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比如对北朝碑志作者所做的有关分析。本书首先对北朝碑志作者的身份进行了分类总结，其次分析了不同作者对北朝碑志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最后还对北朝碑志作者的署名方式和意义做了初步探讨。庾信作为北朝的碑志大家，其作品对北朝后期碑志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本书则辟专节对其创作的经验和价值进行了总结。此外，本书还对北朝碑志创作的材料来源、北朝碑志的虚饰与实录等问题做了有益的分析 and 讨论。

四 研究方法

下面对本书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做一简要介绍。首先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在古史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主张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结合起来，这一研究思路对于本书的写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碑志研究作为金石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的相关著述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纸上材料”。同时，史籍中对碑志的有关记述也成为我们可资利用的珍贵“纸上材料”。而碑志作为实物材料也有相当一部分保存至今，而且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大量新的材料还在不断出现，这些“地下材料”为我们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这一研

^① 韩理洲：《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究方法具备了现实的操作性。

其次是精确统计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研究中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或者得出一个结论，研究者通过精确统计的方法以达到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会使我们对一个问题看得更清楚，也会让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再次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作为本书研究的主体，墓碑与墓志铭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两者在使用功能和文体特征上也有着极为相近的地方，所以在具体研究中，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就成了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此外，这一研究方法在对北朝碑志思想内容进行探讨、分析时也被广泛加以使用。

最后是微观考证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碑志中丰富的信息进行相关史实的考证是传统金石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在本书的写作中也不乏这种研究方法的使用，所不同的是这种微观的考证是与宏观的研究相结合的。比如本书第二章对《李谋墓志》中李氏家族成员的考证就属于典型的微观研究，但是这一细部考证却是为论述北朝碑志中的“事功观念”这一宏观目的服务的。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北朝碑志概述	(1)
第一节 北朝碑志之源流及其历史地位	(1)
一 墓志的起源及其在北朝前的发展	(2)
二 北朝碑志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12)
第二节 北朝碑志创作的时代背景	(14)
第三节 北朝碑志的发展阶段	(21)
一 北朝墓志的发展阶段	(21)
二 北朝墓碑的发展阶段	(33)
结 论	(36)
第二章 北朝碑志的思想世界	(37)
绪 论	(37)
一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37)
二 材料使用的范围及其方法	(38)
第一节 北朝碑志中的家族观念	(40)
一 族源、郡望	(40)
二 婚、宦	(45)
三 家风、门法	(53)
第二节 北朝碑志中的“忠”、“孝”观念	(60)
一 孝为行本的观念	(60)
二 移孝为忠的观念	(70)
第三节 北朝碑志中的事功观念	(77)

一	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	(78)
二	舍生取义、公而忘私的精神	(85)
三	强烈的尚武精神	(88)
第四节	北朝碑志中的生死观念	(93)
一	“好生必去, 恶死会来”	(94)
二	“遭随有命, 倚伏无常”	(103)
三	超越死亡	(108)
结 论		(113)
第三章	北朝碑志的文体研究	(115)
第一节	前代碑志文体研究综述	(117)
第二节	北朝碑志文体的体制研究	(121)
一	总体特征	(121)
二	北朝碑志的志序研究	(133)
三	北朝碑志的铭辞研究	(156)
第三节	北朝碑志文体的题材、内容	(164)
第四节	北朝碑志的语体研究	(173)
一	语音——直观表现	(174)
二	字、句的运用方式及其特点	(179)
三	北朝碑志的典故运用	(188)
四	北朝碑志的语言风格	(210)
第五节	北朝碑志文体的表现方式	(213)
结 论		(220)
第四章	北朝碑志研究中的其他几个问题	(221)
第一节	北朝碑志的作者及其相关问题	(221)
一	北朝碑志作者的分类	(221)
二	作者身份差异对北朝碑志创作的影响	(231)
三	作者署名的目的、意义	(236)
第二节	北朝碑志的材料来源	(238)
第三节	北朝碑志的虚饰与实录	(246)
第四节	庾信的碑志创作及其影响	(254)

一 庾信碑志创作的概况及一般评价	(254)
二 庾信创作对北朝碑志的继承和发展	(256)
三 庾信碑志创作的地位和影响	(264)
结 论	(265)
参考文献	(267)
后 记	(276)

第一章 北朝碑志概述

本章主要对北朝碑志创作的基本情况做一概述。其中将首先探讨北朝碑志的源流及其历史地位，其次对北朝碑志创作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最后尝试对北朝碑志的发展进程做简要分期并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做初步讨论。

第一节 北朝碑志之源流及其历史地位

北朝碑志的创作是对汉魏以来碑志创作的继承与发展，但其中墓碑与墓志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墓碑文作为一种志墓文体到东汉末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和成熟，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写作规范、模式和风格，同时也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包括像蔡邕这样的碑版大家，北朝墓碑文的创作是在这一特定的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墓志作为一种在前代不断孕育的基础上新兴的志墓文体，其大规模的创作实践却是在北朝完成的。随着为数众多的作家、作品的出现，这一新兴文体才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开始形成属于自己的写作规范、模式和风格。所以对墓碑文而言，其继承前代创作的意义更大一些，而对墓志的写作来说，则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成熟的过程，其创新的意义更为突出。所以，本节的主要意图在于梳理北朝碑志创作和发展的源流，特别是北朝墓志发展的渊源，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朝碑志的创作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在开始本问题的讨论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北朝的墓碑与墓志合称为“北朝碑志”，除了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和互动之外，还有叙述上便利的考虑。但是两者作为不同的志墓形式毕竟是存在区别的，所以在具体探讨时，我们对这两类文体形式将分别予以分析，只是在

两者存在关联时才合而论之，这一原则将贯穿于本书的整个写作之中。

与墓志起源的讨论不同，有关墓碑起源的问题，因为研究资料的相对充分，相关讨论已经进行得相当全面和深入，学界也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所以本节将用主要篇幅分析墓志产生的背景、源流问题，在讨论涉及与墓碑有关的问题时，笔者将只对其起源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一 墓志的起源及其在北朝前的发展

作为一种志墓文体，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却是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大体而言，以下几种意见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起源先秦说

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卷九中记载：“唐开元时，人有耕地得比干墓志，刻其文以铜盘曰：‘左林右泉，后岗前道。方世之宁，兹焉是保。……’则墓之有志其来远矣。”^① 宋明以来此说颇有附和者，但大多数学者对这一材料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综合其他文献和考古实践，墓志无论是作为一种丧葬器物还是志墓文体都不可能产生于殷商时期。

（二）起源西汉说

清代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引王昶《金石萃编》的意见称：“王氏萃编曰：‘《西京杂记》称前汉杜子春，临终作文刻石，埋于墓前。《博物志》载西京时，南宫寝殿有醇儒王史威长之葬铭，此实志铭之始。’”^②

（三）起源东汉说

有学者根据出土的石刻材料认为，墓志出现于东汉时期，如罗振玉《辽居稿》于“延平元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跋”一条称：“汉人墓记前人所未见，此为墓志之滥觞。”^③ 而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也持此观点：“其制始于东汉，《隶释》载张宾公妻穿中文，即圻中之刻。”^④

（四）起源魏晋说

持此种意见的学者把魏晋禁碑看作墓志产生的起源，如日本学者日比

① 高承：《事物纪原》（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344页。

② 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7页。

③ 罗振玉：《辽居稿》，民国十八年（1929）石印本。

④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9页。